

■理论探索

新大众文艺与数字媒介时代公共性的重建

□王秋实

新大众文艺利用数字媒介环境,重新激活了一个活的、有连接的文学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辨认机制。它打破了中心化媒介时代中文学既定的主客体关系,让大众摆脱了无声的客体身份,让文学打破了长期的弱连接、迟连接状态。即时的评论、网络文学的“本章说”、同人创作、“玩梗”的互文,大量的读者反馈形成了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不分主客体,是一个文学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强连接、强回应的,亦即拥有了原先由中心化媒介所把握的评价和推介的权力。那些真正用“我”的情感和表达,触及时代情绪、回应共同处境、表达共同经验的作品,会在这个共同体中浮现,然后再不断突破圈层,在一次次阅读、讨论和传播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凝聚起更广大的群体

——为什么是在今天,我们提起新大众文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经被写进“十五五”规划纲要,这背后有何深刻的意味?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对我们深入思考文学问题(包括文学内部的问题和文学外部的问

题)有何启发?

在近来的热议中,我们对新大众文艺本身进行了很多的阐释和讨论,却较少提到这个概念提出的动因,进而对上述问题作出更加深刻的解答。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有建构性的,是由问题驱动的。它的背后映照着更广阔的文艺乃至社会的问题,也似乎寄托着更大的希冀,希望为这个时代及其文艺面临的难题提供一种解法。在我看来,新大众文艺要解决的,也许是在互联网条件下(亦即数字媒介环境下)公共性的重建问题。具体来说,在当前技术环境所带来的分众化社会、分散的经验结构中,文学是否还有发现、表达公共性的能力?文学是否能够借由这种能力重新生成能动性,重新激活最广大的共同经验和共同情感?换言之,在新的语境下,文学是否还能发现大众、凝聚大众?这样的文学雄心,有利于推动文学重新介入社会议题,并进一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机力量。

公共性指向最普遍、最具共性的经验。这种最广大的普遍性,往往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与经验有关。人是生而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引申出我们关于存在、生死、意义、自由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在今天,在人对自我的认知、和他者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被技术环境及其所衍生的更复杂的社会环境重构之时,这些问题有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我们究竟处于怎样的境况,正在经历怎样的新的痛苦、焦虑、希望与可能?我们的文化又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这些共同经验,会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公共性的面貌。

这种公共性往往先是被文学辨认的。文学率先触及那些尚未被命名、尚未被理解的共同经验,使原本隐没于日常生活中的时代处境获得感受的形式,然后触及大众的共同情感。问题被这种文学表达托举出来,随后,更多的学术讨论介入,对这种经验进行概念化、理论化的辨明,使时代逐渐获得关于自身的理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始终在敏锐地处理时代的公共性议题。那些复杂的公共经验和情感,往往都寄托于富有余味的文学之中。我们可以用这种艺术形式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在此时此世的境况、认知和情感,去触摸到时代的总体性。

文学的复杂,背靠着人类根本经验变迁这一命运的宏大的复杂性。为了抵达它,创作者不断去探寻那些不可及之物,去探求语言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体认了人类的情感和经验,也拥有了自身的复杂和深邃。因此,文学始终是个

人性与公共性的一种缠绕——看似是“我”的表达,却照见了共同的经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我”,“我”的复杂中有公共的复杂性存在,“我”是被“我们”托举出来的、具有公共性的黑箱。而这样的“我”开始叙述之时,文学就成了一个时代公共性的表达方式。

二

想要辨认一个时代的总体性与公共性,这并非易事。原因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时代的特质,另一个是文学的问题。

中国今天面临着高度混杂的现代性处境。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并未消失,仍然是我们文化和伦理的根茎性力量;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持续建构,而在我们自晚清至今的、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纠缠;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后现代经验却已经全面进入日常生活,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控制论式的社会控制,真实与虚拟的关系发生重构,家庭结构和情感模式迎来巨变。此外,人工智能横空出世,直击人的存在本身,并带来尚未被明确的诸多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彼此叠加,不同时间尺度的经验同时作用于当代人的生活。今天的中国,很难再用单一的叙事去理解,去产生像以往一样分明有力的共同经验。更何况我们还有规模巨大的人口。这是构成最为复杂的经验的源头。与此同时,全球化也面临诸多新挑战。其所塑造的共同市场、共同叙事正在退却,民族主义盛行。共同经验并没有消失,但被割裂得更加严重,难以辨认。

技术环境加剧了这种混杂和分裂。法国学者德勒兹早年曾提出,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正在不断被拆分,由完整的主体变成可以不断编码、组合的分体。这一预言被互联网平台算法实现,网民(或用户)的行为成为贴着标签的信息,可以被系统分门别类地处理、推送(大多是为了更精准地收割商业利益)。而对在互联网空间生存,并越发将其视为主要生存空间(甚至超过现实社会)的众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进入真正的公共空间,让一个个“标签”的共同体或者说“标签房间”取代了它。而当这种现象和认知成为更为普遍的共识之后,公共空间也许就会消失,“信息茧房”是一个缩影。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难共享同一种经验;表达丰富甚至过剩,却越来越难形成共同理解。这是一个大分众乃至于大分体的时代。

而面对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异常难以识别的总体性,文学实际上做得并不太够。它需要更好地承担起表达和辨认的功能,真正抵达大众、触及共同情感。否则,我们将陷入越来越快的变化之中,进入无暇自觉的茫然、匆忙和庸碌,进入令人恐慌的浮躁。

这也跟技术的变革有些关系,亦即我们喜欢

大谈特谈的互联网传播方式的改变。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消解了中心化媒介的力量。而在过去,文学形成公共经验往往依赖于此。以往中心化媒介确实垄断了信息渠道,从而塑造出了一些公共性。譬如,报刊、电视、电影等,都是强力的中心化媒介。这些媒介推出什么,什么就容易成为公共经验。传统文学就是这样搭载“期刊”这个中心化媒介,一度成为产生公共经验的中心,从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但今天,原来的很多中心化媒介不断失去这种力量。新的媒介平台又如上所言,是高度碎片化的、分众化的,是强化既有圈层而非形成总体性的。中心化媒介的失效势必会带来某种总体性经验的失声,这确乎是一个原因。

但更根本的原因,不应该在传播与机制的表层,而应在内容的里层。不然无法解释现今网络文学与更多流行文艺在这些分众化、碎片化媒介中仍然可以触达大众共同情感的现象。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如何更好地“抓住”时代经验。时代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去抓它的“感觉结构”(雷蒙德·威廉斯语)太困难了。将自然、社会、技术、媒介、情感结构和终极问题同时纳入理解,去感受这个时代独特的“人的境况”,这需要怎样的眼界、襟怀和能力呢?难解全貌,甚至难窥一角。这成了一件挑战重重的事情。于是,个人性变成了一件武器或者一个借口。不少写作者开始回退,退回看似安全、可靠的“我”,来回避这个可怕的难度。大家不断深入私人经验,遣词造句,掘地三尺,不见万物。“我”于是越来越琐碎,抽象难解,“复杂”无比,但却无人问津。然后,圈层化开始,大家抱团取暖,渔歌互答,用“和寡”来论证自己的“曲高”。

深入“我”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我”逐渐脱离了“我们”,那“我”还在吗?是否存在脱离公共性的纯粹个人性呢?文学落入这种“纯粹个人性”的表达,便无法通过一个人的经验,照见时代的共同处境。这时,失去“我们”的“我”,也就失去了宏大的复杂性。复杂的主体不可能是封闭的,它会容纳他者,在痛苦的磨合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勾勒出自身的形状和边界。这本是文学本源性的力量。因此,文学的这种退守,在把主体理解成越发封闭、纯粹、私有、排他的存在之时,事实上也削弱了主体本身。它保护了小小的“我”,同时也失去了“我”得以成立的根基。今天,我们的文学也许就是这样失去了进入广阔世界的勇气,失去了进入复杂性的勇气,进而失去了辨认公共性、表达共同经验结构的能力。

于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学不再拥有强大的总括力,不再拥有介入社会、凝聚大众的动员性力量,便也相应渐渐偏离“中心”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文学沉入防御性的小小的“我”中,自身也失去了力量感和复杂性。那么,在这个大分众、大分体的时代中,我们怎样再次

凝聚?我们怎样相互抵达和理解呢?

三

新大众文艺的登场,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是,它对于我们思考公共性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

公共性的隐没,是今天文学和时代共同面对的境况。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文学需要时代,时代同样非常需要文学。新大众文艺在此刻的被提出,也许寄寓着一种希望或者说使命,我们希望它能够在高度分众化、经验离散、共同理解陷入困难的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下,重新发现大众,重新讲述共同经验,重新建构公共性。

大众是一个现代概念,它将规模巨大的人口组织起来,而不依赖血缘、地域或者熟人社会关系。大众本身其实就映照着一种总体性的想象,意味着一个社会相信,人和人之间能够彼此理解,民族能够形成文化上的共同经验,国家能够在差异中凝聚共识、建构未来。中华文明是统一的文明,从诞生之日起,虽然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始终相信着总体性的未来,相信着未来的可建设、可组织、可共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特别是其五个特征的阐释,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映照着这种总体性的建设逻辑。而这种聚合的总体性之力,是要依靠文化生成的。我们的文化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境况、面对我们此时此世的终极问题?这些答案是可以弥合表面的裂隙的。文化因此被要求承担起凝聚社会、连接大众、形成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而新大众文艺是在这一历史坐标中被提出的,它当然回应了文学发展的自身问题,但也许更是对文化主体性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一种实践探索。

新大众文艺为什么有可能在分化的环境中,完成这项任务呢?我想它探索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生成机制,这个机制是契合当下的数字媒介特征的。新大众文艺首先改变的是表达权的配置,也就是我们说的创作平权。过去,文学更多依赖少数专业写作者完成共同经验的提炼。作家更像一个经验的中介,是中心化媒介时代中文学最大的那个“中心”,人民作为被观察、被讲述的对象而存在。那么,这个经验讲述的范畴、抵达的程度,都是由作家的意愿和水准所圈定的。今天,互联网让创作平权,媒介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本身的去中心化,中介的能量被削弱了,普通人第一次大规模成为文学的主体。数百万创作者进入文学创作,离开被观察、被讲述、被代表的客体位置,以自己不同的生命经验直接进行表达。他们的经验,与无数个个体在真实环境中的经验密切相关,天然携带着“我们”的痕迹。文学第一次拥有如此广阔、如此真实的经验

来源,也因此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时代真实而复杂的生活本身。

但海量的表达并不会自动生成公共性,也可能会带来表达的更加过剩和更加分裂。这是因为,没有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联网只会成为更大的碎片。正如只靠“我们”也绝难生成好的文学,它总是公共性和个人性的缠绕。这中间还缺少重要的一环,即在“我们”中,让真正有连接力量的“我”得以浮现。在这个层面,新大众文艺利用数字媒介环境,重新激活了一个活的、有连接的文学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辨认机制。它打破了中心化媒介时代中文学既定的主客体关系,让大众摆脱了无声的客体身份,让文学打破了长期的弱连接、迟连接状态。即时的评论、网络文学的“本章说”、同人创作、“玩梗”的互文、大量的读者反馈形成了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不分主客体,是一个文学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强连接、强回应的,亦即拥有了原先由中心化媒介所把握的评价和推介的权力。那些真正用“我”的情感和表达,触及时代情绪、回应共同处境、表达共同经验的作品,会在这个共同体中浮现,然后再不断突破圈层,在一次次阅读、讨论和传播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凝聚起更广大的群体。网络文学精品与更多互联网流行文艺的现象级作品,皆是以天才的共情力和表达力,精准地反映了时代情绪和症候,再以这种路径和机制层层“破圈”。“破圈”绝不仅仅是传播层面的事情,它的力量一定来源于经验的共鸣。弥散的、模糊的情绪会在反复引用和阐释中被提炼成意义,触及时代问题本身。算法和标签的分裂会被文学的理解所暂时搁置甚至黏合。个人性会成为公共性得以获得力量、获得痛感与真实性的肉身。如此,公共性摆脱了中心话语的塑造,在千万人的参与中不断浮现、不断被辨认出来,从而凝聚起更强大的总括力。数字媒介固然可能带来碎片化和过剩的表达,但借助于它,碎片也可能重新组织成共同理解,在去中心化的媒介环境中,重新生成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心性经验。

所以,我想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其意在此。它寻找着一种可能,在数字媒介环境中重建文学的公共性,在分化的大众中再度发现“总体化的大众”。文学亟须找回力量感,找回介入甚至改变社会的能动性。这对文学来说是迫切的,对于追求一个总体性未来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迫切的。我们仍然需要文学,纵然技术与时俱进,环境纷繁变化,我们的社会需要自觉,我们的人生需要解答,我们的民族与国家需要共同的想象,这些都需要由文学来参与和承担。文学终究还是要重新鼓起勇气,走入公共性这一巨大、复杂、混沌的空间,去以痛苦获得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大众文艺,都需要去承担这个宏大的、无法回避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八方文讯

专家为《吼一声秦腔震山河》“把脉”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吼一声秦腔震山河》改稿会近日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黄宾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杪樛、《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等围绕作品提出修改意见。该作品作者张紫狐、责编杨新月等参加改稿会。改稿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徐峙主持。

《吼一声秦腔震山河》讲述了脸上有先天胎记的小人物万百顺,从被歧视到在秦腔艺术中找到尊严与热爱,历经重重磨难,最终借助新媒体传承非遗文化的动人故事。小说整体框架清晰,人物形象生动,秦腔技艺描写专业到位,语言鲜活质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专家建议,在后续创作中,作者需要更好地打磨人物和细节,注重群像塑造,进一步深化主题,让表述更加准确规范。张紫狐表示,自己近期已赴陕西实地采访调研,后续将结合专家的建议调整创作,认真打磨作品,提升创作质量。(周 策)

在“分野”处寻找诗意的归途

日前,由诗刊社和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共同主办的周立文诗集《分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及10余位来自诗歌界、文艺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与会。

《分野》是周立文的第5部诗集,共收入诗人近年创作的277首诗歌作品(含组诗、散文诗),构建了一个从故乡河流到

遥远山川、从童年记忆到现代都市的广阔意象空间。吉狄马加表示,《分野》具有思辨深度,语言表达准确,叙事富有张力,个体的生命体验在作者笔下都化成了诗篇,呈现出诗人的主体性思考。与会专家认为,该诗集既有对乡土社会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当代生活的敏锐洞察,是一次关于当代诗歌如何重返现实的诗意探寻。(教鹤然)

专家研讨报告文学《凝聚》

7月28日,由研究出版社、江西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办的凌翼长篇报告文学《凝聚》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胡平、丁晓原、李青松、李春雷、丁波等专家学者及该书作者凌翼与会交流。研讨会由研究出版社副总经理朱建伟主持。

《凝聚》将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北京大学的改革、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等重大事件贯通起来,通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鲁迅等历史人物的思想探索和革命实践,呈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历史必然性。与会者认为,该作品选题重大、视野开阔,以北大红楼为叙事支点,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有机联结起来,深入挖掘历史细节,在宏大叙事与个体书写之间兼顾历史性与文学性,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大众化表达提供了有益启示。专家建议,可进一步打磨语言精准度,适度呈现历史考证过程,增强作者在场感,力求在建党题材报告文学领域实现新突破。(王泓桦 印筱萌)

未来文学主题座谈会在深圳举行

鹏城文学院作家签约仪式暨未来文学主题座谈会日前在广东深圳举行。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北京大学教授、鹏城文学院名誉院长陈平原,以及杨黎光、吴岩、吴君、

江玉琴、程林、霍盛亚等专家学者与会。大家认为,深圳文学始终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书写着城市和时代的故事。文学是文化原创力的动力引擎与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深圳提出打造未来文学全新样态,是传承“艺文”传统、回应时代命题、焕新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探索。要扎根人民、立足实践讲好深圳故事,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万气象。

活动现场,“文学在场”品牌系列暨《深圳短篇小说十二家》出版项目启动。钟二毛、央歌儿、陈再见、傅九、姜二曼成为2026年首批5位鹏城文学院签约作家。(康春华)

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颁奖

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颁奖仪式日前在浙江湖州举行。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浙江省作协指导,中国诗歌学会散文诗工作委员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州师范大学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浙江文学院联合主办。

颁奖仪式上,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邹岳汉获荣誉奖,成路的《秦岭谣诗》获主奖,王幅明的《玄鸟归来》、牧风的《大地聲音》获提名奖,蔡森韵的《南疆木器》获新锐奖,杨眉的译著《褶皱间生活》获翻译奖。谢冕、王山、周庆荣、沈苇、温永东等为获奖者颁奖。活动期间,获奖诗人走进湖州观风书城,与读者交流创作心得,获赠获奖诗集。周庆荣散文诗集《凝视》研讨会、“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主题采访等活动同期举行。

探索数字时代人文叙事新形态

“文学超界面：AIGC影像实验”展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

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AIGC影像课堂”合作计划同期启动。该项目由腾讯新闻《我有一个想法》生态计划推动,腾讯新闻、《人民文学》、北京信息化协会共同发起,邀请作家与AIGC导演团队跨界共创,以数字影像转译文学内核,为文学搭建表达新界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文学超界面”项目艺术顾问、导演李少红,项目创想者、《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项目主理人王姝薪等与会。

此次展映的5部AIGC短片分别改编自徐则臣与王姝薪的文学作品,生动呈现了文学AI转译的可能性。与会者认为,当前AIGC浪潮正在重构内容产业,AI创作的难点在于文学文本的视觉化转化,以及对AI生成边界的适配。AI可反复迭代的特性,让创作拥有了实拍难以实现的灵活度与试错空间。AI创作既要坚守艺术常识与标准,也要对新形态保持开放姿态。

解锁马王堆的N种“打开方式”

由译林出版社、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解锁马王堆的N种‘打开方式’：《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举行。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喻燕姣、“解谜大师”品牌创始人戴莹与会,围绕新书创作、马王堆考古历史、文物价值、科普创新形式等展开深度对话。

马王堆汉墓是20世纪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国内已出版多部专业考古报告,但内容相对艰深。《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及配套解谜游戏“狸猫学宫·六子窠”,融图文、互动与解谜于一体,让普通读者不用深入研读大部头文献就能了解马王堆汉墓全貌,实地参观时也能对照书中内容看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让专业考古知识贴近大众生活,为文博IP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教鹤然)